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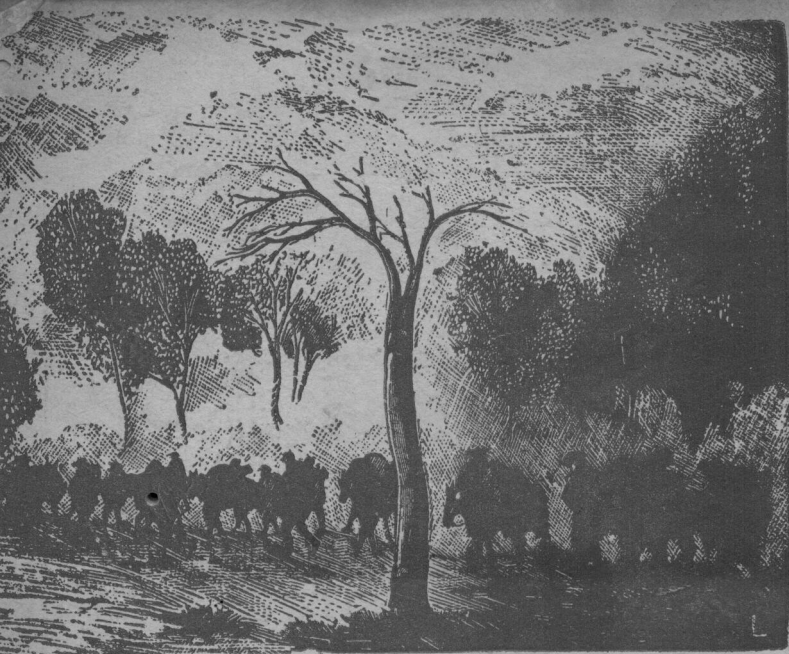
今文學叢刊

第一本

東海跨著

郭沫若等著

春明書店印行



郭沫若

編 主 境 另 孔

本 一 第 刊 叢 學 文 今

海東著跨

著 等 若 沫 郭

行 印 店 書 明 春

文 訊

第七卷 第五期
文藝專號

水陽江的沉鬱
落魄曉角
霜天斷手
普希金晚年詩抄
明辨是非
大路上

再談郁達夫
V.P.卡泰耶夫訪問記
論餘讀筆
工餘讀筆
小部與整風波
局家庭風波

汪碧會 袁克木 戈寶權 唐健吾
李健吾 戈寶權 袁克木 唐健吾
者行印
局書通文
號二路州中海上

郭沫若 茅盾 葉聖陶 朱自清 許北 艾北 劉北 汪碧會 袁克木 戈寶權 唐健吾
定價每冊一元
元十萬一

學人學指南

書厚六百餘頁

內容豐富新穎

伯璋主編
定價一萬零四元

本書係根據部頒修正之各版高中教科書及各大學入學課題，以及最新參考材料編輯而成，對各學科均作扼要精密的編撰，全書一部，無異為一整套教科書之縮本。俾讀者閱畢本書，等於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全般學識。如能熟習記憶，融會貫通，投考國內各大學以及獨立學院，均可應付裕如，不致再感困難。

（優待讀者實售）
（八折寄費加二）

春明書店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初版

今文學叢刊 第一本

東 跨 海 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每本二萬八千八百元

著者 郭沫若

郭沫若

春明書店編輯部
福建中路五三三弄三號

主編人 孔另境

孔另境

陳冠英

發行所

春明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福州路畫錦里口
電話：九四八一二號

經售處

上海五洲書報社
南京聚珍書局
杭州志成書局
廣州聚珍書局

廣告價目	底封面	底裏	普通全頁	目錄前後	普通半頁
	二萬·〇〇〇	一萬·〇〇〇	一萬·〇〇〇	一萬·〇〇〇	一萬·〇〇〇

今文學叢刊第一本 目次

今文學叢刊的刊行……………編者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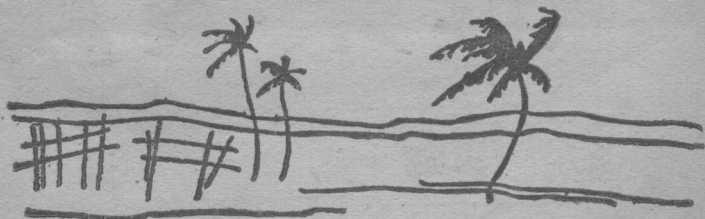
跨着東海……………長篇連載……………郭沫若 二

記耐克拉索夫博物館……………茅盾 三

離散……………小說……………碧野 完

麗瑞倫特……………小說……………英·莫理遜作
希凡譯 四

工餘隨筆……………葉聖陶 五



重逢 小說

艾蕪 究

六幢 小說

日・丹羽文雄作
曹成修譯 〇

浩瀚的海 散文

范泉 炎

騙子 小說

臧克家 允

曹老師 小說

孔另境 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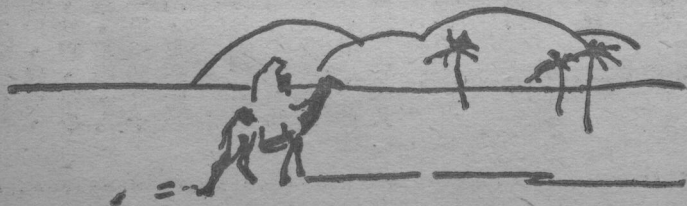
在克洛默海濱 散文

英・赫德生作
李霽野譯 三

霧 長篇連載

西・烏拿莫諾作
艾昂甫譯 三

裝幀：錢君匋
木刻：劉峴



今文學叢刊的刊行

編者

今文學叢刊的刊行是寫作者與出版者共同勞作的成就，在目前，這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因為除了一切物質的困難以外，還得要具備最大的毅力，我們不但要使牠開花就完事，更期望牠結一點果實出來，即使不能結出「長生不老藥」，也總得是一顆含有維太命的東西。期望是如此，能不能達到，那就要看「吃客們」的「胃口」了。「吃客們」的胃口自來不同，要統一談不到的，而且也大可不必，但願我們這裏所配的菜肴，不至於使「吃客們」倒胃口，那末，即使只是一二樣合自己口味的，於編者也是莫大的安慰了。

中國新文藝的成長，雖已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歲月，對於大眾的影響，實在還微薄得很，所以新文藝發展的趨向，必然應盡量和大眾接近，一切新文藝工作者都不會忘記這個必要的條件，本叢刊的願望，就是想把我們主觀上認為還可以的作品，呈獻在大眾的面前。同時，我們也期待大眾的指教。

本刊將以不變的宗旨，每月刊印一本，呈獻於讀者的面前！

跨着東海

高壽

一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大約是在下旬吧，我經過了「由廣東到廣東」的北伐戰役之後，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已經是被通緝的一名亡命之徒了。

那時候創造社還存在，出版部設在北四川路的麥拿里，成仿吾，鄭伯奇，王獨清，穆木天，都已經從廣州回到了上海。我的日本夫人安那女士帶着四個孩子賃居在寶樂安路的一棟小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大抵是日本的居留民，我也就暫時潛伏在這兒。

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國也是不能久呆的，往那兒走呢？

那時最初的計畫是到蘇聯，而且決定全家都去。

在行期未定之前，我不甘寂寞地也寫過一些文章，是用「麥克昂」的變名發表的。當時的英國宰相是工黨的麥克唐 (Mac Donall)，我這個變名有人以為是摹倣他，想和他攀為兄弟，其實我的用意倒別有所在。我這「麥克」是 maker (作者) 的音譯，「昂」者我也，所以「麥克昂」

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但也有用我的本名發表的文字，最值得記述的應該是「浮士德」第一部的譯文的整理了。

我開始翻譯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運動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間。我翻譯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苦訴着學枷智梏的束縛的那一場獨白，少年歌德的狂飈時代的心境正適合於五四前後的一般智識青年的心境，我的譯文在當年的雙十節上海時事新報的增刊上發表了，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鳴。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學社的勸誘，要我把全部譯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間只把第一部譯出了，艱澀的第二部我沒有工夫譯，而且也不想譯，出版便成了問題。第一部的譯稿帶在身邊，一直延擱了十年，中間還經過一次鼠災，老鼠在原稿上砌窩，把前半最難譯的一部分幾乎全糟踏了。

潛伏在竇樂安路的一座亭子間裏，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的時間，我把損失了的補譯起來，把殘存的舊稿也澈底潤色了一遍，僅僅費了十天工夫便把這項工作完成了。這在我當時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譯文相當滿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經驗和心境含孕在裏面，使譯文成長了起來，可見延擱的十年也並不是空費。浮士德作了復活節的春遊，由原野回到書齋之後，所唱出的這幾句：

「嗟我小齋中，燈火今復燃，

胸底生光明，深知知內觀。

花開希望蕊，理智復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完全是我當時從戰場的馳騁中回到小房間裏的如實的心境；生活雖然受着限制，希望是非常蔥蘢

的。我有着這樣的自信，我在這句譯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寫下它們時是還要豐富些的。整理完畢，立即交給創造社付排，在這次是沒有受着絲毫的阻礙了。

自然我也過問過創造社本身的業務。

創造社成立出版部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東們湊合起來的。（前一向章靳以先生曾經告訴我，他也是當年的一位小股東。）成立雖然僅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們的愛護，業務的發展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個文學俱樂部，每頓開飯，連主帶客常常是兩大圓桌。但這盛況並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風雨激盪中的海燕。因為我個人的政治關係，在孫傳芳統治江蘇的時代，它已經幾乎遭了封閉，在孫傳芳被打倒之後，它是更加危殆了。

我是愛護創造社的，尤其愛護創造社在青年中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我想一面加強它，一面也要為它做些掩護的工作。怎樣去加強它呢？我在人事上發動了李一氓和陽翰笙來參加，同時又通過鄭伯奇和蔣光慈的活動，請求魯迅先生合作。魯迅先生那時也由廣州回上海來了，對於我的合作的邀請，他是慨然允諾了的。

怎樣來掩護呢？我當時所擬定的辦法是這樣：第一是恢復「創造週報」，專以青年為對象；其次是充實「創造月刊」使它從純文藝的範圍擴展而為綜合性的；更其次是發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叢書。我們從第一步做起，曾經在報章上登過恢復「創造週報」的啟事，在這啟事上是以魯迅先生的名字領銜，我以麥克昂的變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鄭伯奇，蔣光慈等。

但這計劃卻不料來了意外的對折。我在訂這計劃的時候，仿吾到日本去了。我滿以為他對於

這個計劃是會同意的，因為求其速成，我在事前並沒有徵求他的同意。而仿吾在日本方面，卻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訂了一個新的計劃，便是要把創造社作爲明朗的思想戰的基地，要盡力從事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推闡工作。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鏡我，馮乃超，李鐵聲，他們是少壯派，氣銳非常，革命情緒火熱地高漲，就爲了推行這一計劃，大都臨到大學快畢業了，把畢業試驗拋棄，陸續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兩個計劃彼此不接頭，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個相持的局面。我主張等仿吾回來，彼此談好之後，再來一個抉擇。打電報去催仿吾，仿吾也從日本回來了。他堅決反對「創造週報」的復活，認爲週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支持回國朋友們的建議，要出版戰鬪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後來這個名字沒有用，是改爲了「文化批判」）對於和魯迅先生合作的事情，都很冷淡。到了這樣，卻是該我自己來抉擇自己的態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堅持我的主張，照當時的情形看來，創造社便可能分裂，這是我所極不願意的。並且我不久便要去國，仿吾對於將來的創造社要負更多的責任，照着他所樂意的計劃進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更何況新的主張，雖然危險得一點，說不定是更合理的辦法，沒有經過實驗，我也不好憑空反對。因此我也就退讓了。

這些事情的醞釀和進行，大約就在十一月那一個月裏面，而我的退讓就表現在專心整理「浮士德」的那個期間，那是十一月的下旬。我的第一部譯後記裏面保存着了這個日期，那兒記着「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譯竣」，文中也明明說到「自着手以來僅僅只有十天的工夫。」出國的行期一天一天地迫促了，雖不能決定在那一天，但總不出十二月初旬。因爲要到北國

去不能不預備些禦寒的服裝，於是大人製了皮外套，小人也製了些厚實的大衣。沒有多的錢，像毛襪，毛手套，和圍巾之類，不能夠買，便只好靠安那自己用絨線來編製，那真可是把她累煞了。

當時的中蘇邦交已經不絕如線，上海的蘇聯領事館曾經被人襲擊，蘇聯的船只剩最後一隻以備領事館人員的撤退了。我們是被允許搭乘這一隻船由上海直駛海參威，再經由西比利亞往莫斯科。船，聽說也不敢靠碼頭，只停在吳淞口外，上船時要用小划子載去。

一切的準備都粗略地停當了，朋友們也先後替我們餞了行，我們在十二月五號的下午得到了一個通知是六號動身。動身前會有人來接，我們須得在家裏等候。我自己彷彿回到了幼年時代，自己感覺着興奮而愉快，從此可以到我所渴慕着的地方了。

六號那一天，孩子們都穿了一身新，也非常高興，少數的朋友偷偷地來送行，集中在那一樓一底的房子裏。七家都興奮着從清早等到了中午，又從中午等到快吃晚飯的時候，臨時的通知來了——船不能開，發生了障礙，開船的日期到決定後再臨時的通知。

這是一個意外的打折，但還不算嚴重，因為船早遲總是要開的。但就在這個打折之後，卻來了一個更大的打折，決定了我挨後十年乃至半生的生活路徑，那可不能不算嚴重了。

十二月八號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頭痛，四十度的高熱，臉色發紅而帶浮腫，兩眼充血，自信對於疾病尚屬頑強的身子一得病便不能起床了。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無起色，經過日本醫生的診察，疑是斑疹傷寒。於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進病院了。要進病院吧，也不能夠公開。只好偷偷摸摸地進了一家在北四川路上的私人醫院。這是日本醫師石井勇開的。他和我先

後同學，而且是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

入院後在開始的兩個禮拜當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覺。不斷地發出譫囈，時而表現狂暴。聽說在最嚴重的時候，醫師已經關照了安那，可以準備後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來。病在兩星期之後漸漸的好轉，雖然好得很慢，在病院裏差不多住了四個禮拜，才回到家裏，但我依然是活着了。回家的時候還不能走路，上樓是四腳四爪爬上去的。

醫生說我抵抗力強，是死裏逃生。得了斑疹傷寒的人，在三十歲以上的過半數是要死亡的。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事實上有一位和我約略同時得病的人的確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齋藤花子。桂博士和我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在北伐前後，他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任教職，後來做過院長。我們是同學，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擔任過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長），因此在廣州的一段時期，花子夫人和安那，更因同國的關係，是特別親密的，她們就和姊妹一樣。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廣州來到上海來，他們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親。船過上海的時候有一夜的逗留，在當天晚上他們是被留宿在我經常坐臥的一座亭子間裏面的。就只這麼一夜，我們便分別了。但等到第二年的正月初頭，我退了院，正在養病的時候，桂博士一個人孤影悄然地從日本回來了。夫人呢？死了！就在到東京之後不久，害了斑疹傷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顯的，我們是同時受了傳染。

斑疹傷寒是靠著蝨子傳染的。我們雖然雖住在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裏，但我們比較愛潔淨，周

團的日本人也是比較愛潔淨的，無論怎樣不至於生出蟲子來。這蟲子的來源，毫無疑問，是桂博士和花子夫人在幾天的船上生活中由船上帶了下來。花子夫人早在船上受了傳染，而我又受了她的傳染的傳染，就這樣，我們雖然隔着一個東海，卻差不多同時害了同樣的病，而她是死了，我是活下來了。再補充一點醫學智識吧，斑疹傷寒的潛伏期是有十天到十四天的間隔的，算起和花子夫人留宿在我們家裏的日期和我們發病的時期來，恰恰合拍。

我的命雖然留下來了，但我也失掉了很重要的一些東西。我的兩隻耳朵，在十七歲時得過一次腸傷寒已經是有些重聽的，再經這一次的斑疹傷寒，在大病初癒時差不多把聽覺完全失掉了。但這還是小事，而更重要的便是我一家人失掉了赴蘇聯的機會。

蘇聯的船是十二月十二日開放的。那天最後的通知雖然來了，但正是在我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安那後來告訴我，假使我在這之前死了，她都是決心把孩子們帶去了的，但我卻沒有死。

真是一個大遺憾！一個偶然的因素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一世，甚至於一家一族。我時常在這樣作想。假使我不發病，我當然決不會有俟後十年間陷在日本的侷促的生活的。更假使發病得遲幾天，我已經上了船，由於海浪的顛簸，及車船的勞頓，我可能死在旅途上，但我的家族是過着了一種生活的。這不真真是命運在作弄人嗎？

自然我是不相信命運的，但這一偶然的播弄，怎說的好呢？它確確實實地影響了我乃至一家族人的半生。

大病新癒，但我也贏得到一番新生的歡喜。「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儘管是無足輕重的生命，留下了總還是有用處的。我自然得歡喜。但這歡喜也不單是心理上的感覺，而是在生理上也好像更始一新了的一樣。大約是由於久病中的絕食，和病癒後的嚴格的食物限制的原故吧，口味非常的清恬，情趣也非常之明朗。短期間，我差不多什麼憂慮都一掃而空了。

在恢復期中有過失眠的現象發生，繼續了差不多有兩個禮拜光景。白日黑晚躺在床上，絲毫的睡意也沒有。頭腦非常的清醒，而且一點也不感覺疲倦，一點也不感覺焦燥。詩的感興，倒連續地湧出了。不，不是湧出，而像從外邊侵襲來的那樣。我睡在床上，把一冊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詩興，立即拿着一枝鉛筆來紀錄，公然也就錄成了一個集子，那便是曾經出版而且遭過禁止的「恢復」了。像那樣受着詩興的連續不斷的侵襲，我平生只有過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後收在「女神」裏面的那些作品的產生，一次是寫「瓶」的時候，再一次便是這「恢復」的寫出了。但這寫「恢復」時比前兩次是更加清醒的。

隨着身體的漸漸恢復，睡眠也漸漸恢復了，一切的生活都漸漸恢復了病前的原狀。但詩興消失了，而焦慮卻逐漸地跑來代替了它。蘇聯是去不成了，祖國是不能呆的，往那兒跑呢？最值得焦慮的是拖着位日本夫人和四個小兒女。大的一個兒子已經九歲了，超過了入小學的年齡已經三年，第二個兒子也七歲了，已經到了入學的年齡，這些尤其是使他們的母親焦急的一件事。我因為在外邊奔跑，長期地離開了他們；他們住的地方也不會固定下去，上海，廣州，武漢，上海，不斷地在轉徙，住得最久的地方也不過一年光景而已。他們平時是很少同中國的小朋友們接觸的，雖然請了家庭教師，也沒收到多麼大的效果，他們的中國話實在懂得很有限。這怎麼辦

呢？這在他們母親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帶着他們回日本去了。這裏是我的一個苦悶。日本我是不甘願去的，但爲兒女們作想，我又不能不去。在當時我可能走的，似乎也就只有這一條路了。假使有錢，跑歐美自然也可以，但這談何容易！即使弄得到護照，弄得到路費，向歐美跑去了，將來的生活怎樣呢？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家的問題呀！我爲這，逐漸逐漸地感受沉重的苦悶了。有的朋友勸我一個人離開，把家眷留在上海，有的朋友又勸我一個人留在上海把家眷送往日本，但兩者都有困難，孩子們太多又太小了，安那又是日本人，結果還是決定了全家都到日本去的路。

作了那樣的決定已經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雖然還軟弱得一點，但我已經能走路了。我應該感謝成仿吾和創造社的其它的朋友們，是他們經過商量的結果，在我赴日之後，每個月送我一百元的生活費。當時的一元約略抵日本的一圓，雖不能算是怎樣的豐裕，但也不能夠說是怎樣的菲薄了。好，到日本去吧！路是人走出來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在當時要往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要護照，也不要任何人的允許，只要你買一張船票，便隨時隨地都可以讓你登陸。問題倒是在上海上船的時候了。一家人同船走吧，人太多，容易被注意到。弄得不好在碼頭上便會被人扣留。同船是不行的，只好分開。我一個人乘一隻日本郵船，赴神戶登陸。讓安那帶着四個兒女，乘上海和長崎間的聯絡船，由長崎登陸，再改乘火車在神戶聚齊。乘聯絡船是要快些的，只須一天一夜便可以到長崎，再由長崎乘火車，那比起輪船來更要快了。因此假使同日乘船安那們是會先到神戶的，到了神戶在輪船碼頭上更容易接着我了。

上船的日期我現在已經不記憶了，總之是在二月下旬。但在上船的頭一天晚上卻小小的起了一點風波。有朋友來報告，據說當時的龍華司令部已經打聽了我住的地址，寶樂安路是屬於越界

築路的範圍，當天晚上要準備來拿人了。於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兩個人跑到內山書店，由內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匯山碼頭上船的時候，送行的也只有內山老板一人。我真個是孤孤單單地離開了我很不情願離開的祖國。祖國並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卻不能不離開了。在開船的時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國，潛潛地流下了眼淚。

買船票的時候我用的是假名「吳誠」，南昌大學的教授，目的是往東京視察教育。因此我就一個人呆在「吳誠」的艙房裏，連飲食都是叫人搬進艙裏來吃的，一直呆了三天。

三天後的上午，到達了神戶。下船的時候，既無護照須驗，也沒有行李待查，雖然有新聞記者來探聽消息，他們看見「吳誠」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過了。我是第一個下船的客人，在碼頭上很快地便和安那見了面。

安那和四個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館裏面。她打聽到了輪船到碼頭的時刻，便把孩子們寄放着，到碼頭來迎接我來了。我們在「花屋」聚齊，就在當天下午又乘火車往東京。

往東京，落在什麼地方呢？

我在民國三年的正月（一九一四）初到日本的時候，在東京學習日本話，費了半年，那年的六月，考上了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爲中國留學生特設的預科，在學的期限又是一年。這一年半是我在東京住得最長的時間，以後便被分配到鄉下去了。高等學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岡山（Okayama）的第十高等裏面渡過的。醫科大學是九州島上福岡市（Fukuoka）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在這兒前後渡過了五年。東京，在我是比較生疎的地方，我在那兒沒有什麼朋友，無論

中國人或日本人。就有，也經過多年的離別，不知道他們的住處了。

我和安那最初的相遇是在東京，那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暑間，我已經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級讀完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國人辦的東京的京橋醫院裏治療，我趁着暑假由岡山往東京去看他。那時候安那在那醫院裏服務。她本是仙台（Sendai）的人，才從教會學校裏畢業，到東京想學習產科的。我們偶然的在那兒會面了，因而相愛，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岡山同居。因此，安那在東京也還沒住上一年，她在東京，一樣也是沒有朋友的。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橫濱，在從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門親戚：因為安那和我的結合根本是沒有徵求過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現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東京，究竟投奔什麼地方呢？假使我們有多的錢落在旅館裏，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那有那樣多的錢？假使是一個人還好說話，而無奈又是一家六口。

這些早就苦惱過我們，但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已經在火車的三等車中顛簸着了，安那才好像突然得到一個天來的靈感一樣。她很高興地告訴我：我們決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雖然死了，她和安那的情誼很深，她的娘家當然是知道我們的存在的。她的兩老還存在，父親是一位木匠師傅，還有一位年青的兄弟在住着慶應義塾的大學部。那當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據說在兼營着「貸間」的副業——把剩餘的房間來租給學生，連帶着供給食膳，是一種變相的小規模的旅店。唯其是這樣的人家，最好作為我們的投奔的對象，我也很樂意地表示了